

1950—1966年博物馆出国展览与中国新形象表达

徐 玲

(郑州大学考古学系 河南郑州 450000)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建构国家新形象以消解早期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博物馆展览的直观形象表达优势,受到此时期国家文化宣传部门的重视。1950—1966年,国家组织的博物馆出国展览通过“新”“独立”及“文明”等主题性叙事,向国外主动展示中国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形象长期“他者化”的局面,为中国国际形象的重新表达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博物馆出国展览 中国新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文化外交 博物馆史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1949年后的“新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超出时间顺序上先后的本意,更多表达了努力告别旧时代、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意愿。在国家建设层面,政府在积极创造社会主义新成就的同时,还希望全面向国内外展示国家新形象,尤其是重新表达国际形象。1950—1966年,中国博物馆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收藏优势,在出国展览中通过特定的主题叙事对外宣传国家新形象。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国际形象的展示议题引起学界关注^[1],但从博物馆出国展览角度系统考察此时期国际形象塑造的研究尚不多见^[2]。有鉴于此,笔者参阅相关日记、档案及报刊等史料,从早期国外博物馆呈现的中国形象与国人反观、博物馆出国展览中的“新中国”表达及博物馆出国展览的影响等方面,探讨1950—1966年博物馆出国展览中的中国新形象表达,以期深化和丰富博物馆史的研究。

一、早期国外博物馆呈现的中国形象与国人反观

受制于“天朝上国”思维,近代之前中国既缺乏主动向外表达自身形象的意识,也不重视他国对中国形象的评价。很长时间里,“有关中国的信

息、形象反而是通过西方来华者传播出去的”^[3]。被“他者化”的形象成为国际对中国的主流认知模式:

具体的微观形象有“东亚病夫”的精神形象,“小脚女人”和“猪尾巴”的社会风俗形象,“面黄肌瘦”“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的民众形象,“一盘散沙”“满地烟馆”的民族形象,“兵丁羸弱”“乌枪古炮”的国防形象,官员无知贪墨的官场形象等。^[4]

早期国外博物馆遵循“他者化”中国形象的模式,在进步史观思维下,将中国物件作为进化序列中落后的“标本”置于展览中。在衬托西方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塑造了中国停滞、愚昧的老大帝国形象。如英国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在展出中国文物时,曾将除瓷器之外的中国文物全部归入了“人种学类”^[5]。这些展览“使我们的民族显得一无是处”^[6],成为“他们想象中的令人恶心和厌恶的所谓的中国文明”^[7]。由此,早期国外博物馆成为中国负面形象传播的集中地。

随着出国参观博物馆机会的增多,国人开始关注国外博物馆呈现的中国形象问题。1886年,驻美大使张荫桓参观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收稿日期:2020-08-14

作者简介:徐玲(1969—),女,郑州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近代文化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物馆史研究(1949—1966)”(18BKG039)的阶段性成果。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时,认为其“所藏中国器物绝无佳品”。1936年,旅居美国的报人伍庄在其《美国游记》中记述参观纽约美术博物馆(今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时发现“院内陈列之中国物,则多为北京琉璃厂货,无精美者”,并认为欧美博物馆收藏鉴赏中国美术品者“其眼光多拙劣,不能以为在大博物院而信之也”^[8],明确质疑了欧美博物馆对中国文化的赏鉴力。

1949年后,国外博物馆“他者化”中国形象的状况并未改善。1949年郑振铎等人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在参观捷克斯洛伐克的人类博物馆时发现“中国器物列入野蛮人的一群”^[9]。1953年郑振铎赴苏联参观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今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Oriental Culture),见展出的中国绘画“像周昉、赵子昂、王振鹏、文徵明、仇英,乃至恽格、戴熙,无一不伪”^[10]。1955年,中国博物馆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发现苏联的一些博物馆仍在公开陈列中国的“小脚妇女绣花鞋、大烟枪等”^[11]。同年,王振铎赴民主德国考察博物馆,所见同样令人失望,认为其社会“对中国认识有神秘的错误印象”^[12]。如一家博物馆在展示中国时所选的物品有“鸦片战争中龙旗两面,马鞍一个,破胄一个,水烟袋一个,鸦片烟枪一个,旱烟杆二个”。除此之外,王振铎还发现多家博物馆将中国物品混同日本等国物品,“中国瓷器室日本货陈列乱杂”^[13]。1958年,中国博物馆工作者访问罗马尼亚、波兰时发现在两国的许多博物馆展出的中国物品“既不能代表中国的历史传统,更不能表现现代中国的艺术成就”^[14]。

以上国人的反观活动成为中国博物馆出国举办展览、打破“他者化”局面、重新表达国家形象的驱动力之一。

二、博物馆出国展览的中国新形象表达

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消减负面认知影响、重塑国家形象,成为争取国际认可、确立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议题。早在1948年5月,《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旧中国在消亡,新中国在前进》^[15],拉开了去除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贴上的贫穷和愚昧等负面形象标签、创造国家人民生活全新历史时期的大幕。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6]毛泽东描绘的“新中国”,“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

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7],这成为对中国新形象的基本定调。其中“新”“独立”和“文明”等作为中国新形象的关键词,成为此后博物馆出国展览(表一)中国形象表达的主要意涵。

首先是“新”的意涵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被认为是把一个破败不堪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18]。出国展览主题强调1949年以后国家建设新成就和新变化的展示。如1950年赴苏联等国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以下简称“中国艺展”),初步拟定的陈列计划中就强调了“今日的中国”的表达,展览目的设定为古代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并重,“将使苏联人民看到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艺术和新中国的艺术发展,通过画面,也看到新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19]。展览顺序有意安排为:“第一部分是现代油画,以表现今日的中国,然后按照年代由史前至清,最后是木刻、年画、新国画,给人以新中国的印象结束”^[20]。为满足“新”形象的主题表达,该展览选取了多达五百件的现代工艺品、美术作品以及解放战争和生产建设时期的照片等。此后赴苏联的“中国工农业展览会”更专门展出了四千多件代表1949年以后中国工农业建设成就的物品^[21]。

此时期博物馆出国展览中表现国家新成就的艺术品内容很丰富,既有传统的陶瓷、雕刻工艺品、漆器等,也有反映1949年以后中国日常生活的年画、剪纸、刺绣、编织及民间玩具等。1955年赴苏联的“中国实用艺术展览会”展出了2500件中国瓷器、漆器、银器和象牙工艺品等^[22]。1957年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赴捷克斯洛伐克的“浙江省蚕丝展览”更是以中国地方特色工艺品为主题,展示了中国蚕丝业的新发展。1959年在保加利亚举办的“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中,还专门展出了民间年画。1960年、1962年两次“中国现代陶瓷展览”展品则为五百多件驰名中外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1949年以后生产的陶瓷器,分别来自江西景德镇、广东石湾、湖南醴陵、浙江龙泉和河北唐山等地。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生产的景德镇陶瓷器多次出现在出国展览中^[23],成为中国新形象的标识物。

其次是“独立”的意涵表达。相对于“新”形象的表达,长期受制于人的中国在1949年以后表达“独立”国家形象的意愿更为强烈,独立自主办展的主体性意识表现在博物馆出国展览的各个环节。

表一// 1950—1966年中国主办的博物馆出国展览一览表

名称	时间	展出地	特色
中国文物展览会	1950	苏联	文物主题展
中国月展览	1950	捷克斯洛伐克	文物主题展
新中国展览会	1950	罗马尼亚	文物主题展
中国艺术展览会	1950	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等	文物和现代艺术品并重,多国巡展,规模大
中国文化艺术展览会	1951	印度	文物主题展
中国工农业展览会	1953	苏联	工农业产品
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	1954	匈牙利、保加利亚	工艺美术主题
中国绘画展览会	1955	英国	绘画主题展
中国实用艺术展览会	1955	苏联	瓷器、漆器、银器和象牙制品等实用器
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	1955	缅甸	工艺美术主题展
中国古代艺术展览会	1956	芬兰	古代文物主题展
中国绘画展览会	1956	南斯拉夫	绘画主题展
浙江省蚕丝展览	1957	捷克斯洛伐克	中国地方物产主题
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	1957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敦煌艺术主题展
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	1958	日本	敦煌艺术主题展
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	1959	保加利亚	中国现代画家作品
中国陶瓷展览会	1959	苏联	陶瓷主题展
中国现代陶瓷展览	1960	保加利亚	1949年以后的中国陶瓷器
中国现代陶瓷展览	1962	民主德国	1949年以后的中国陶瓷器
中国永乐宫壁画展览	1963	日本	永乐宫壁画艺术展
中国西安碑林拓片(本)展览	1965	日本	碑林文字、书法主题展
中国陶瓷考古展览	1966	日本	陶瓷考古主题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中华民国政府主办的博物馆出国展览,影响较大的有1935年的“中国艺术英伦国际展览会”和1940年的“中国艺术展览会”。然而查阅两次展览相关资料,发现在办展话语权上民国政府并未受到尊重。如1935年赴英展览的英方主事者特别强调欧洲趣味(European taste),从组织方式、展品选择、展览场地、展览形式及宣传方式等严格把持,并不采纳中国的博物馆随展人员的意见^[24]。因缺乏办展话语权,中国成为在场的缺席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在承续民国时期博物馆出国展览由政府主办、多家博物馆参与、国内预展等模式的同时,开始力争办展的主体性权利。从展览主题、展品选择、展览地点、展览形式到展览宣传等均拒绝国外机构或个人干预,办展过程始终坚持中国主体性原则,向

国际社会明确传达“独立”的中国形象。1950年“中国艺展”虽开端于苏联政府的邀约,但在随后的展览展品选择和解释、展品布置方式以及展览场地选择等,均坚持了中国独立自主办展的原则。该展览由文化部统一筹办,最终参展的一千多件展品全部由中国博物馆专家独立选取^[25]。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随展出国,接洽安排展览事宜。赴苏后,王冶秋率队考察苏方安排的莫斯科展览场地——美术学院楼上,发现场地空间过于狭窄,不适宜大规模展出和观赏,即与苏方交涉争取新的展览场地,最终成功将展览地点调换成世界著名的特列季亚科夫艺术馆(The Tretyakov Gallery)^[26]。此次展览地点的交涉成功影响很大,一改往日中国展览不被重视的局面,随后在列宁格勒展出时场地为著名的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The Hermitage Museum),在乌克兰的展览场地为条件较好的东西方艺术博物馆(The Khanenko Museum)^[27]。“中国艺展”巡展至其他国家时,展览地点均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博物馆^[28]。在可见的资料中发现,此后博物馆出国展览的地点安排时,中方的意愿基本上都得到了尊重。

最后是“文明”的意涵表达。针对早期国外博物馆呈现的中国停滞、落后的形象,1950—1966年博物馆出国展览集中选取精美的、富有民族代表性的文物作为展品,以表达中国文明深厚和悠久的形象。

1949年以后博物馆最早举办的四次出国展览中,除了1950年“中国艺展”由古代文物与现代艺术品组成外,其他三次“中国文物展览会”“中国月展览”及“新中国展览会”均以文物展示为主题。即使古今并重的1950年“中国艺展”,仍以最精美的文物为出国展品首选。如北京历史博物馆选取了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文物和浙江绍兴出土文物,就被中国博物馆专家评价为“精绝”^[29],也被中国观众评论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物品”^[30]。当时出国展览的文物多是精挑细选的、最具中华文明代表性的文物。以陶瓷类为例,1950年拟定的出国展览陶瓷类文物选取原则是“要求每个时代各大窑址的代表性文物,带款识、文字,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纹饰等文物为主,时代上尽量全等”^[31]。据此选取的陶瓷类文物既有甘肃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器、山东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黑陶器;也有明清时期的精美陶瓷器,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官窑的精品陶瓷器。此时期选取最具代表性、最好的文物出国展示国家文明成为共识且影响深远。此后分别在欧洲和日本展出的甘肃敦煌艺术、山西永乐宫壁画艺术等,均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物展示国家文明为目标。如在日本东京、大阪举办的“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展出了“敦煌窟中由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到宋、西夏、元等朝代的壁画的摹本、摄影和彩塑模本等三百多件展品”^[32],成为向日本传播中国文明的特殊物件。

王冶秋在1956年全国博物馆会议上讲道:“六年来博物馆方面参加或举办了多次出国展览(包括苏联、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介绍并宣扬了祖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33]这是对此时期博物馆出国展览宣扬国家文明形象的一个总结。作为文明载体的文物属于特殊物品,为了有效遏制近代以来的文物流失,1950年中国颁

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并设置了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实施严格的文物出境许可^[34]。但1950—1966年仍坚持选用珍贵文物原件出国展览,也侧面反映了展示国家文明形象的一种急迫意愿。

三、博物馆出国展览的影响

1950—1966年博物馆出国展览分别以“新”“独立”和“文明”为主要意涵,努力表达中国新形象的尝试,对当时及以后博物馆发展影响很大。一方面,这些展览有效革新了展出地博物馆及其观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另一方面,出国展览带动更多国内博物馆工作者到国外实地感受国外博物馆文化,并开始从更广的视角审视自身不足,与展出地学术交流意识增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出国展览对展出地博物馆的影响较为明显,一些博物馆开始主动举办中国主题式的展览,部分博物馆还在馆内设立中国专馆(部室)等。1950年承办过“中国艺展”的特别季亚科夫艺术馆主动举办“中国年画展览会”;1951年乌克兰东西方艺术博物馆正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部,集中展示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35];1952年,苏联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利用特有的中国收藏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办展期间经常为苏联学生举办有关中国文化艺术的报告会^[36];1954年该博物馆又举办大型“中国艺术品流动展览会”,在苏联各地巡回展出^[37]。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中国艺术陈列部在1957年才正式建成^[38],但早在1952年就开始积极协助其他艺术博物馆成立中国艺术部,如苏联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艺术品专室、乌兹别克国立艺术博物馆(The Uzbekistan National Museum of Art)中国艺术部等^[39]。此类活动引发了苏联其他机构关注中国问题,并开始主动举办有关中国文化的各种展览^[40]。

受苏联博物馆影响,其他国家博物馆也开始设立中国专馆(部室)等。1954年匈牙利布达佩斯东亚博物馆(The East Asia Museum, Budapest)开始筹备一个常年开放的中国博物馆,以便“陈列许多现代和过去的中国艺术家的绘画和木刻”^[41];1956年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Museum, Sweden)“计划把国内的中国文物集中起来,成立一个中国博物馆”^[42]。1958年罗马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Art of Romania)、波兰克拉考夫国立博物馆(The

Krakov National Museum, Poland)等专设了东方艺术部,两国的其他几家博物馆也开始积极筹备专设中国部(室)^[43]。

此时期留存的关于博物馆出国展览中展出地观众的观展情况,如观展人数、观展反映等相关材料并不多,有限史料仅可参考中国国内报刊的报道记录,如《人民日报》报道了1950年“中国艺展”在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的观众人数及开幕盛况等^[44],《文物参考资料》则记录了苏联观众的一些观展评价^[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出国展览对国内博物馆的影响同样深远,随着国内博物馆界学术交流意识的增强,与展出地联系日益频繁。影响较大的如1954年故宫博物院主动邀请民主德国汉学家爱德华·埃尔克斯(Eduard Erkes)来华举办学术讲座。埃尔克斯介绍了中国古代文物和近代艺术品在莱比锡的博物馆陈列情况以及柏林的历史博物馆陈列工作等,还重点谈论“历史与艺术性博物馆的区分,以及考古发掘品的临时展览与交博物馆保存陈列的方式问题”^[46],使中国博物馆界及时了解了民主德国部分博物馆的发展情况。1955年文化部首次派出中国博物馆代表团访苏,主要目的是学习苏联博物馆的经验,借以促进我国博物馆文物事业的发展^[47]。此次访问不仅对中国博物馆全面借鉴苏联博物馆理论与方法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带动国内更多博物馆重视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活动。仅在1956年,受邀前来中国博物馆访问、举办讲座的就有越南、蒙古、埃及、澳大利亚、比利时和新西兰等国的数十位专家^[48]。随着1956—1957年博物馆出国展览次数的增多,到中国博物馆参观访问、学术交流的国外专家也随之增多。1957年苏联代表团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座谈会,首都六家博物馆共36人参加。代表团中的三位考古、博物馆专家巴甫洛夫(B. В. Павлов)、格鲁哈略娃(O. Н. Глухарева)和嘉柯诺娃(H. В. В. Дьяконова)专门用一个月时间参观考察了南京、苏州、杭州、上海、济南、北京等地的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同时在以上城市举办了超过二十次的座谈会^[49]。同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纳波尔斯坦克(Náprstek)博物馆专家瓦茨拉夫·肖尔茨(Václav Scholz)到中国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访问,参观了13个城市的15家博物馆。他在介绍捷克斯洛伐克博物馆工作经验的同时,对中国博物馆工作也提出了有益的建议^[50]。此后不久,苏联博物馆专家来华参观了中央自然博物

馆、徐悲鸿纪念馆等,介绍了苏联学校与博物馆间建立密切联系的情况^[51]。1959年,保加利亚博物馆代表团来华,首都博物馆界专门安排了与代表团两位专家米尔契夫(Mirchev)和札姆博夫(Zambov)的座谈会,两位专家介绍了参观中国各地博物馆的印象和建议^[52]。同年,民主德国艺术史家代表团来华,参观了北京、上海、杭州、西安、洛阳等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发掘情况后,在故宫博物院的座谈会上交流了博物馆工作意见^[53]。1963年,波兰文化艺术部博物馆和历史古迹保护管理局局长米·普塔什尼克(M. Putashnik)和华沙历史博物馆馆长亚努什·杜尔科(Yanush Durko)来华,在各地博物馆参观访问了三周^[54]。

以上来华专家参观考察博物馆,带给中国博物馆更多的办馆经验和新的学术理念。因此,当时的国内博物馆都很重视外国代表团的参观考察工作,除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外,从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陕西省博物馆(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相关材料中,也可以发现这几家博物馆同样重视外宾的参观访问工作: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博物馆学专家曾昭燏亲自为外宾讲解^[55];上海博物馆在1952—1957年接待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代表团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艺术、科学代表团和博物馆专家^[56];陕西省博物馆为了更好地接待外宾,1955年专门“增开一个供专家研究和外宾参观的保管性的陈列室”^[57],为迎接国庆十周年期间大量外宾的参观,特意调整了博物馆的展览规划^[58],早在1961年就开始为外宾提供专门的导引和简介服务等^[59]。

总之,国外博物馆主动举办的中国主题展览和中国专馆(部室)建设,无疑拓展了中国文化在国外传播的渠道,使展出地观众能够接收更多的中国文化信息,从而修正对中国形象的原有认知。国内博物馆与国际社会的学术交流,又为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国际舞台,更全面表达中国形象增添了新的专业支持。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而言,以上受出国展览影响所引发的国内外博物馆活动,同样可理解为中国博物馆表达中国新形象的另一种方式。

四、余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博物馆为消解国际上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采取走出去主动表达国家新形象的努力,显示出1949年以后博物馆在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担当。在出国展览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办展原则,革新了被长期封

闭在国外博物馆中的国家形象,其行为本身就是中国新形象的一种有力表达。整体上,因服务于国家形象重塑的强烈政治意愿,此时期博物馆出国展览一方面调用全国博物馆藏品,形成展览的文物数量多、级别高、历史时间跨度大、品类全等特点,在彰显深厚、丰富中华文明的同时,还关注到1949年以后国家建设新成就的展示,向国外宣扬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新形象。不可否认的是,受时代所限,此时期出国展览同样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为追求展览规模和展览轰动性,对展览细节打磨不够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展览的表达效果,使1950—1966年博物馆通过出国展览表达中国新形象的期望打了折扣。

[1]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国家国际形象展示的相关研究,对本文启发较大的成果有:胡斌《何以代表中国:中国在世博会上的展示与国家形象的呈现》(岭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输出”部分对1949—1966年中国在世博会上的国家形象展示问题作了探讨,指出此时期世博会上呈现的中国形象具有明显的政治使命;夏松涛《建国初期展览会与共产党形象的构建(1949—1957)》(《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探讨1949—1957年展览会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问题,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尝试呈现给世界一幅“农业中国”“王朝中国”及“文化中国”三位一体的新形象;王海燕《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建国17年(1949年—1965年)绘画题材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则从国际美术交流角度探讨了1949—1965年中国形象的塑造问题,认为此时期的美术展览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对国家形象的一种视觉和精神塑造等。

[2]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博物馆出国展览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赖荣幸《新中国第一次中国艺术海外展的模式与意义——1950年苏联“中国艺术展”》(《美术研究》2014年第2期),从中苏美术交流层面探讨了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模式和意义等。

[3]李金铮:《方法的内外互补:“中国史”学界的中国与西方》,《史学月刊》2018年第8期。

[4]江轶:《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构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5]Craig Clunas. China in Britain: The Imperial Collections. In Tim Barrigner, Tom Flynn. *Colonialism and the Object: Empire,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Museu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41-51.

[6]XIAN WEI:《博览会中之耻》,《中西日报》1915年3月19日。

[7][美]苏珊·费恩斯贝纳著、肖笛译:《一个预置的紫禁城?——记1915年中华民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美术馆》2008年第2期。

[8]史勇:《中国文物“走出去”的早年故事》,《光明日报》2018年7月7日第9版。

[9]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1949年4月28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88页。

[10]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1953年12月10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9页。

[11]陈乔:《幸存的访苏日记》,《中国博物馆》1993年第4期。

[12]《王振铎先生访问东德日记》(一),《中国博物馆》1994年第2期。

[13]《王振铎先生考察德国日记》(续),《中国博物馆》1994年第4期。

[14]王一平、陈建平:《访问罗、波两国的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

[15]《旧中国在消亡,新中国在前进》,《人民日报》1948年5月26日第1版。

[16]《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5页。

[17]《新民主主义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18][美]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19]王冶秋:《列宁城“中国艺展”开幕词》,《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

[20]《本局简讯·王冶秋副局长已于九月五日抵苏》,《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9期。

[21]彭明:《中苏友谊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9页。

[22]《中国实用艺术展览会在苏联哈尔科夫美术博物馆开幕》,《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

[23]《工作动态·江西景德镇瓷器展览》,《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00期。

[24]傅振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参观记》,《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

[25]《参加苏联“中国艺展”古代艺术品选品统计表》,《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7期。

[26]同[20]。

[27]《基辅中国艺术展览会的成就》,《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1期。

[28]《民主德国教育部主办中国艺术展览会揭幕乌布利希赞扬新中国文化的成就》,《人民日报》1951年5月17日第4版。

[29]马衡:《马衡日记(附诗钞):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1949年9月6日),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30]《苏联举行“中国艺术展览会” 我展览品千余件已启

- 程运苏》，《人民日报》1950年9月9日第3版。
- [31]《参加苏联“中国艺展”古代艺术品目录》，《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7期。
- [32]《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在东京开幕》，《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
- [33]王冶秋：《发展博物馆事业，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 [34]《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950年5月24日），国家文物局编《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 [35]《敖德萨一博物馆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部”》，《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
- [36]《中国的展览在苏联》，《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1期。
- [37]同[36]。
- [38]《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中国艺术陈列部开幕》，《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 [39]同[36]。
- [40]同[36]。
- [41]《布达佩斯筹备常年开放的中国博物馆》，《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 [42]李文信：《记瑞典和芬兰的几所博物馆》，《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 [43]同[14]。
- [44]《一年来苏联大力巩固中苏人民友谊促进文化交流》，《人民日报》1951年2月17日。
- [45]《“中国艺展”在苏联的盛况》，《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0期。
- [46]《故宫博物院邀约民主德国汉学家埃尔克斯先生座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
- [47]陈乔：《幸存的访苏日记》，《中国博物馆》1993年第4期。
- [48]《学术动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
- [49]博集：《苏联博物馆代表团座谈会记录摘要》，《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 [50]和平：《随捷克专家肖尔茨博士参观纪要》，《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
- [51]新星：《向苏联专家学习》，《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
- [52]《保加利亚博物馆代表团在我国访问举行座谈》，《文物》1959年第7期。
- [53]《德国艺术家史家代表团在我国访问举行座谈》，《文物》1959年第7期。
- [54]《波兰人民共和国博物馆工作者来我国访问》，《文物》1963年第12期。
- [55]朱元春：《怀想曾昭燏》，[EB/OL][2019-12-03][2020-08-10] https://webplus.nju.edu.cn/_s26/c3/be/c27275a4-43326/page.psp。
- [56]郑为：《祖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上海博物馆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 [57]《陕西省博物馆一九五五年工作总结》（1956年1月2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2-1-36）。
- [58]《陕西省博物馆庆祝建国十周年调整方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2-2-219）。
- [59]《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1961年工作总结和1962年工作计划》（1961年12月1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2-2-470）。

International Travelling Exhibitions and the Expression of China's New Image in 1950-1966

XU Ling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0)

Abstrac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aced a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its early years, and how to construct a new image of the country to dispel the negative international perceptions of China became a crucial issues of nation building. As a result, the advantages of museum exhibitions in expressing visual images were valued by the national cultu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The museum exhibitions organized by the state from 1950 to 1966 made a uniqu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re-express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through thematic narratives such as "new", "independence" and "civilization", which actively presented a new image of China abroad and broke the long-standing "othering" of China's imag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ravelling exhibitions; new image of China;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ultural diplomacy; museum history)

(责任编辑:黄洋;校对:张蕾)